



政治学新经典

# 理解 韦伯

Understanding Weber

[英] 山姆·威姆斯特 (Sam Whimster) 著  
童庆平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政治学新经典

# 理解韦伯

〔英〕山姆·威姆斯特 (Sam Whimster) 著  
童庆平 译



Understanding Weber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解韦伯 / (英) 威姆斯特 (Whimster, S.) 著; 童庆平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1

书名原文: Understanding Weber

ISBN 978 - 7 - 5117 - 2217 - 1

I. ①理…

II. ①威…②童…

III. ①韦伯, M. (1864 ~ 1920) - 社会学 - 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7525 号

## 理解韦伯

---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杜永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0. 7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00 元

---

网 址: [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mailto: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New Political Weeks*

## 理解韦伯

《理解韦伯》为韦伯著作的中心议题提供了一个通俗易懂而又综合全面的解释。利用最新的学术成就以及最新版本的韦伯作品，山姆·维姆斯特在全范围、深度及进展上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与文化科学之方法进行了探讨。这是一本具有拓荒意义的著作：

- 它确定了韦伯著作中的核心议题，并且把它们与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与文化科学的黄金时代联系起来；
- 它认为在当今，韦伯对古典传统的主要阐释者仍然保持着重大的影响；
- 它对集历史学家、社会经济学家、方法论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于一身的韦伯的职业生涯动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

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被看作是对权力、法律、统治、文化、宗教、文明的结构以及经济社会学之实质性领域的一种成功并仍然有效的阐释。在从宏大的理论研究向经验主义的政策研究转折的关头，为了理解全球化之现代性的动力学，这本论著坚决维护韦伯构想的权威，并且对他的遗产进行批判性的继承。

《理解韦伯》是了解韦伯著作不可或缺的指南，并且将会成为《必不可少的韦伯》(*The Essential Weber*) (劳特利奇出版社 2004 年) 非常宝贵的姐妹篇。这本书密切地追寻着韦伯思想的发展轨迹；这种探究将会让它成为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以及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必购之读物。

山姆·维姆斯特是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杂志的特约审稿人。他还是《马克斯·韦伯研究》这本国际性杂志的编辑，已经出版了大量论述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这些出版物包括《马克斯·韦伯与无政府状态的文化》(*Max Weber and the Culture of Anarchy*) (1999 年) 以及《必不可少的韦伯》(2004 年)。

## 献 词

理性的世界可以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不朽的个体，它永不停息地创造出那种具有必然性的东西，从而控制着偶然性的东西。

歌德（来自多恩堡的信，1928年7月）

这样一连串的辩论构成的历史链条，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无悔无怨地拼合在一起而没有一丝缝隙，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让自己完全隐藏于其中；但尽管如此，所有存在于那里的事物还是通过伟大的人物而不由自主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难道不辉煌灿烂吗？

米娜·特布勒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给她母亲的信，1912年10月）

## 致 谢 辞

如同在《必不可少的韦伯》一书中一样，在这部论著中大量的学识与争论吸收了韦伯研究国际网络中生动活泼的不同版本。第二章和第六章的更早版本已经分别发表了：第二章发表在由克劳斯·利奇布劳（Klaus Lichtblau）编辑的《马克斯·韦伯的“基本概念”》（*Max Webers "Grundbegriffe"*）中，第六章发表在由卡尔-路德维格·艾义（Karl-Ludwig Ay）与克努特·博尔查特（Knut Borchardt）编辑的《马克斯·韦伯的巨大影响力》（*Das Faszinosum Max Weber*）中；我要感谢这些文集的编辑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研讨会——会议在比勒菲尔德与慕尼黑召开——并且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两章。许多人给我提供了特别的帮助，他们阅读并讨论了本书原稿的各个部分、提出了各种建议、提供了各种信息并且指导我纠正错误。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我还要感谢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约翰·布罗伊利（John Breuilly）、辛纳克·布鲁恩斯（Hinnerk Bruhns）、汉斯·亨里克·布鲁恩（Hans Henrik Bruun）、布莱恩·赫尔（Brian Hall）、伊迪丝·汉克（Edith Hanke）、奥斯汀·哈灵顿（Austin Harrington）、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雷蒙德·李（Raymond Lee）、哈特穆特·莱曼（Hartmut Lehmann）、穆罕默德·纳菲斯（Mohammad Nafissi）、凯瑞·帕罗内（Kari Palonen）、顾恩德·罗斯（Guenther Roth）、尤兰达·茹阿诺（Yolanda Ruano）、基思·特瑞伯（Keith Tribe）以及斯提芬·特纳（Stephen Turner）。我还必须感谢格哈德·鲍姆加藤（Gerhard Boomgaarden）以及他在劳特利奇出版社的团队，他们理解我并且推动我成功地完成了这部著作。

## 缩写语表

Archiv:《社会学与社会政治学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AS:《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R. I. 弗兰克斯(Frank)编辑与翻译;伦敦:新左派图书公司(New Left Books)1976年版。

Cat:《解释社会学的一些范畴》(“Some Categories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 格兰博(Graber)译;《社会学季刊》(*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81年总第22期,第151~180页。

EEWR:《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Economic Ethics of the World Religions*)。

EOPS:《经济与社会秩序和权力》(*Economy and the Orders and Powers of Society*)。这是1914年的“大纲计划(the Outline Plan)”中的标题,其初稿最终作为《经济与社会》的第二部分而发表。

ES:《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 罗斯(Roth)与C. 维提克(Wittich)编;纽约:贝德明斯特(Bedminster)出版社1968年版。

EW:《必不可少的韦伯》(*Essential Weber*), 山姆·维姆斯特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4年版。

FMW:《马克斯·韦伯论文选》(*From Max Weber*), H·H. 格斯(Gerth)与C. W. 米尔斯(Mills)主编及翻译;伦敦:劳特利奇与开根·保罗(Kegan Paul)出版社1947年版。

GARS:《宗教社会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共三册;图宾根(Tübingen):J. C. B. 莫尔(Mohr) (保罗·西贝克[Paul Siebeck])出版社1920—1921年版。

GAWL:《科学理论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J. 温克尔曼(Winckelmann)编;图宾根:J. C. B. 莫尔(保罗·西贝克)出版社1973年版。

MWG:《马克斯·韦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 H. 拜尔(Baier), M. R. 莱普修斯(Lepsius), W. J. 莫姆森(Mommsen)与J. 温克尔曼编;图宾根:J. C. B. 莫尔(保罗·西贝克)出版社1984年开始出版。

PE Debate: 《新教伦理之争》 (*The Protestant Ethic Debate*), D. 卡尔克拉夫特 (Chalcraft) 与 A. 哈灵顿 (Harrington) 编; A. 哈灵顿与 M. 希尔兹 (Shields) 译; 利物浦: 利物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PESC: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sup>①</sup>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译; 伦敦: 艾伦与安文 (Allen & Unwin) 出版社 1930 年版。

SocRel: 《宗教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E. 费斯科夫 (Fischhoff) 译; 伦敦: 梅休因 (Methuen) 出版社 1965 年版。

---

① 在 PESC 的第二版及修订版中, 韦伯在标题中去掉了“精神”(“精神 [Geist]”)两边的引号。

## 内容简介

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学者本杰明·尼尔森（Benjamin Nelson）针对马克斯·韦伯的作品提出了一些非常直接而又简单的问题。他号召人们要恰当地欣赏韦伯多年学术生活的核心意图与视野。他注意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批判性版本的新教伦理文章，可以让我们“看到韦伯的思考视野是如何随着背景的转移而转移的，而这些背景是由各种各样的批评者所要求于他的”。尼尔森说，“如果不对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以及在《作者的引言》中附有插图的社会阶层讨论进行概略的、共时性的阅读”，那就没有希望对他毕生的研究工作进行令人信服而又综合全面的解读。尼尔森正确地察觉到，韦伯的最后一篇署名文章是其毕生学术知识的浓缩沉淀，它能够成为韦伯的目标提供“一条支配性的线索”。<sup>①</sup>

在这种探究中令尼尔森感到激动的是，他揭示了一种他称之为“社会文化进程差异化的历史社会学”的完整的测度标准，这种社会学将澄清文明化的结构布局。尼尔森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复杂的社会就其核心制度、定位方案及科学技术而言都正在经历着非同寻常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人们将不得不循着韦伯的引领而行。

他呼唤人们要注意“‘宗教信仰’与‘世俗世界’、组织化与调节性的司法结构、公共的以及联合的生活模式、集体的与个体的认同以及身份这些不同变量的混合搭配”。这是未来社会学的日常工作，是一项将“对我们的共同目标之必然进展有所助益”的日常工作。<sup>②</sup>

他推测说，“我们有强烈的理由相信，如果韦伯活过了1920年，那他很有可能已经进一步彻底改写了《新教伦理》的论证与重点”，他应该已经给“现代的、‘理性的’西方科学技术之独特起源与特征”增添了更大的声誉。有可能无法理解“我们西方的现代生活”即资本主义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我们不通过科学与情感的历史性合理化角度，并在所有思想与行动领域整体去看的话。

---

① B. Nelson, "Max Weber's 'Author's Introduction' (1920): A Master Clue to his Main Aims", *Sociological Inquiry*, 44, 4, 1974, pp. 269-78.

② Nelson, p. 275.

韦伯作品的宏大主题是文化、宗教、资本主义以及权力。尼尔森示意了这些主题的重要意义，他还提出需要在韦伯工作的整个主干部分内更为精确地定位这些主题。凯瑟琳·科利奥特-斯丽娜（Catherine Colliot-Thélène）在2006年撰文并对法国重新关注韦伯式社会学进行评论，她注意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退却以及结构主义范式的消逝（‘喘息 [essoufflement]’）而遗留下理论领域的空白”，伴随着这一变化的是求助于政策专家取代批判性反思。她写道：每当宗教的社会影响与政治影响邂逅到一种重新燃起的旨趣，这种空白就已出现了。<sup>①</sup> 这强化了本杰明·尼尔森更早时期对社会学提出的要求，即可以在相互关联的错杂情形中分析现代性的文明化动力。

本书辩称，虽然对韦伯的信任是恰如其分的（well placed），但这种信任只能经由下列方式来加以证明：更密切地研究韦伯的学科范围的全部维度；研究他的理念与兴趣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尼尔森做出了正确的推测：1920年的《作者的引言》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重点——强调西方的科学与技术——相比于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ESC）中提出的观点论证更加严谨，这个重点为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奠定了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可以很容易加以证明。《作者的引言》突出地显示了贯穿于西方历史中的理性主义无处不在的价值。在1904—1905年间，新教伦理的研究工作极力强调一种形式的理性主义（禁欲主义的生活行为），这种形式的理性主义成了西方基督教之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并且从发生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一直在持续发展。我们如何权衡与清教主义的“案例研究”相关的更大叙事呢？只能更多地取决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回答。清教主义作为一种形式的理性主义，被清晰地限定在它的范围之内，因为清教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思路狭窄的、寻求上苍保佑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西方的理性主义，特别是尼尔森突出强调的科学，可能因为更大的正当性而声称具有更为广泛的有效性。

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韦伯可能已经彻底改写了其关于新教伦理研究的辩护，虽然同样有相当多的学术证据表明韦伯最初的论文已经远远偏离了其初始的停泊位置——即使韦伯不准备承认这一点。这预示着与韦伯作品的密切交锋必然会是一个批判性事件：一个不认可韦伯自己的估计与辩护的事件，一个准备提出超越于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议题的事件。

浏览一下现代的学术成就，对韦伯的著作我们做过尼尔森所要求的那种

---

<sup>①</sup> C. Colliot-Thélène, *La Sociologie de Max Weber*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p. 6.

纵观全局的、历时性的说明吗？并没有完全如此。在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学编辑过程中，《马克斯·韦伯全集》已经公开出版了韦伯三分之二的作品。依据这个编辑的规则，每一个文本的日期标注、文本起源与上下文背景都必须公之于众。但是，有一些重要的文本并没有清晰的起源或日期。例如，所谓的《经济与社会》的“较早部分”就包括在韦伯去世后才被发现的、装在没有标志的棕色信封之中的诸文本。就遗存下来的这些文本状态而言，韦伯可能并不打算去出版它们。我们对这些文本是否有一个纵观全局的即一个全面的看法呢？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没有这种看法，这不仅仅是因为牵扯到确定文本日期的困难。马克斯·韦伯的评论人员通常试图对韦伯众多而各异的著作提出一个整体的解释；他们经常选用理性化作为这个整合的主题。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做了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工作，以便展示韦伯的各种想法是如何发展的，它们是如何再次出现在诸科研计划之中的、它们是如何形成一个或多或少是有系统的统一体的。<sup>①</sup> 在《必不可少的韦伯》中，我认为我的选择具有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尤其是因为可以认为韦伯对其研究工作的各个部门进行了相互参照。例如，《经济与社会》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后者构成了《宗教社会学论文选集》的主要部分）追求与众不同但又互为补充的路径。

但是，一部最重要的学术文本选集与尼尔森公开宣布的纵观全局与历时性解释是大不相同的。PESC 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部迸发天赋的作品，但其难以与韦伯的其余著作完全协调起来。在《必不可少的韦伯》中，我选择的只是其最后一章的一部分，在我的评论中我宁愿相信韦伯更靠后的构想（从1915年开始），在后来的构想中韦伯把新教伦理的主题整合到了对于儒家思想的比较之中。我的选集也回避了劳伦斯·斯卡夫（Lawrence Scaff）称之为“韦伯式社会学之前的韦伯”这个问题，他所指的是先于PESC（《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在1890年代的作品。<sup>②</sup> 1890年代韦伯写出的研究成果犹如一座小山，而主流的社会科学一直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个情况。这种情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最近的学术成就矫正了，尤其是他在1890年代之后的大部分作品都通过《马克斯·韦伯全集》而出版了。但是，他1890年代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国民经济学方面的成果——在许多方面却引发出一

---

① 参见他的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 G. Roth (tra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以及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N. Solomon (tra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② L. Scaff, "Weber before Weberian Sociology", in *Reading Weber*, K. Tribe (ed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15-41.

个问题：他为什么转而去研究新教。与某些评论人员截然不同，韦伯并不是为了发展宗教社会学才进入这一领域的。韦伯对当时盛行的社会学形式并不喜欢，他仅仅是在大约1910年才发展出他自己的社会学版本，以处理宗教与经济比较研究中的诸重大问题。辩称PESC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回应，这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国民经济学——在当时是一个范围广阔的学科——中的情况要比这种辩护复杂得多。

我们现在对马克斯·韦伯的生活了解得更多了。许多学者已经获得接近各种档案的权力，并阅读了韦伯的大量通信，《马克斯·韦伯全集》已经发表了他在1906—1914年期间的信件。<sup>①</sup> 日益浮现出来的是一幅非常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个性图景。在那段高产时期他得了某种程度的情感紊乱症，紧接着高产时期而来的则是真正的抑郁沮丧或精疲力竭。他试图通过药物治疗来消除这些情感紊乱病症，当时他使用了相当大剂量的、以鸦片制剂为基本成分的药物来平抑自己的易兴奋性。他形成了一种在整个秋季与冬季刻苦工作，然后在复活节与整个夏季几个月里进行康复的模式。他是一个对刺激反应强烈的人，很容易因敏锐的竞争意识而受到刺激，同事们的学术活动则是产生刺激的东西。在社会科学、文化科学以及历史科学领域，韦伯都是“黄金时代（golden era）”的一部分，他从许多重要人物那里获取学术营养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重要人物如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恩斯特·特洛尔茨（Ernst Troeltsch）、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他们都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还是古代史、中世纪史与现代史领域的主要史学家。他有一种奔放而又敏感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他的工作；对于后来解读韦伯工作的人员而言这些方式已被证明是相当棘手的。韦伯尽管非常具有原创性，但他并不倾向于表明他的研究工作与这一领域的先前研究工作有着怎样的关联，只有通过更加密切地关注于他的脚注与资料来源才能够触及到持续不断的辩论图景。他从来没有承认自己的弱点——其中归根结底都是些非常大胆的假设和理论建设；他经常指责他的批评家们——多少有点偏狭地——误解了他所创作的成果。各种作品是如何在其大脑中起源的、他认为诸作品的潜在弱点可能是什么，对于这些我们都只能妄加

---

<sup>①</sup> 参见 G. Roth, *Max Webers deutsch - englische Familiengeschichte 1800—1950*（《马克斯·韦伯的德英家族史 1800—1950》），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1；J. Radkau, *Max Weber. Die Leidenschaft des Denkens*, Munich: Hanser, 2005；S. Whimster (eds.), *Max Weber and the Culture of Anarch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猜测了。

我们从韦伯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他有一种令人惊叹的能力；因为具有极大的权威和广博的知识，他看起来似乎能够对任何主题进行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即席的，临时性的 *ex tempore*）谈话。<sup>①</sup> 他不是一个超人。他也做笔记，而且像所有学者一样依赖图书馆和馆际互借。但是，《经济与社会》的第一个草稿是以极快的速度直接写出来的，当时由于充满了新的想法和计划，所以韦伯是如此的热情（fired）。把韦伯看作是一个能够策划出原创性主题，然后随意地与它一起自娱自乐的大师，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1904—1905年间，PESC以杂志论文的形式发表。大约在1912年，它又再次交织地出现在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之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论述“政治与僧侣统治的规则”这一大章里，它又被合并到一个对宗教与政治历史的更为传统的叙述之中。1915年，在一个与儒家思想几乎是对称性的比较（差异比较）中它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正如尼尔逊所注意到的，通过更为广博的理性主义主题它又被覆盖在1920年的《作者的引言》之内。

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尼尔森正在吁求的那种仔细的、纵观全局的、历时性的图景被韦伯的知识分子个性排除在外了。恩斯特·特洛尔茨与所有人一样了解韦伯，1917年10月他受邀为波恩（Bonn）大学提供一份关于韦伯的报告——其目的在于学校有一个可能要任命的职位。他在报告中说，韦伯目前正全神贯注于社会学，但作为国民经济学领域的一名教授，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再次重新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学。他还说韦伯有两种思想：一种是绝对主义的思想，他几乎是基于本能的立场支持正义与公平；另一种是相对主义的思想，他能够把任何行动、思想或决定归纳为社会学的现实以及潜在的利益。后一种思想非常尖刻并且愤世嫉俗。“对我来说，顺便说一句”特洛尔茨说道，“他在许多方面深刻地看都是有问题的，难以彻底了解。我不知道他最终的知识分子动机是什么。”<sup>②</sup> 因此，不能完全精准地对韦伯进行准确说明。他能够同时从事两个科研项目，他会告诉出版商，他最新的兴趣将不会因为其他某些原先商定的研究合同与截止日期而分散精力。无论如何，我们在看待韦伯的研究产量时需要某种程度的小心谨慎，不应该给它强加上一个过于严格的规范（schoolmasterly order）。他是一个运用各种材料与理念的大师：他

---

① 参见论文集 *Max Weber zum Gedächtnis*（《马克思·韦伯回忆录》），R. König and J. Winckelmann (eds.), Cologne: Westdeutscher Verlag, 1963.

② F. W. Graf, “Ernst Troeltsch’s Evaluation of Max and Alfred Weber.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 Letter by Ernst Troeltsch to Heinrich Dietzel”, *Max Weber Studies*, 4. 1, 2004, p. 105.

可以陈述一个主题，把它颠倒过来，引入另一个与它相提并论的旋律，甚至可能对这个主题感到厌烦。瑞义纳·莱普修斯已经注意到，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在他被肺炎击倒之前），韦伯正打算写关于文化、托尔斯泰（Tolstoy）与音乐的作品——这是一次理智与焦点的转换——此时他已经完成了《经济与社会》以及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sup>①</sup>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有点儿小心翼翼地表达了韦伯用以创作的格式的独有特征。他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写作格式——随笔论文、研究调查和研究报告、百科全书条目、学术论文、期刊文章以及学术性公开演讲。韦伯很少采取专著的形式——只有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与教授资格论文以及一份农业调查报告是以专著的形式面世的。比起专著形式来他更喜欢的是长篇论文，需要加以注意的是许多韦伯的“专著”实际上都是他的论文集。有一些论文是韦伯有意要构成一部论文集的独立存在单元，例如《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韦伯的其他作品论文集都是在他去世之后由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韦伯的夫人）收集在一起的。有一点绝对要强调一下：在韦伯的一生中，只有一篇文本的英语译本可以看作是由他出版的等同于专著的作品——他的博士论文。<sup>②</sup>《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篇论文；《经济与社会》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编辑起来的手稿和修订样本的结集。

诸论文的联合、相互补充以及排列次序可以描绘出来，但是我并不打算把这些强加于韦伯的著作之上。考虑一下他的最大问题：什么才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因果性起源？韦伯的职业生涯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创造新的方法论与新的研究成果来回答该问题的过程。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这种问题无法用满足一致同意的、有关因果证据的学术标准方法来回答。在这一点上，问题就演变成了现代性在西方究竟是如何发展的，以及类似的基于宗教的生活行为轨迹在其他文明中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如何”的问题正如确切的因果性起源的具体要求一样意义重大而有效。我对韦伯职业生涯的感觉是，他是以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独特解释（按照清教徒

---

① M. R. Lepsius, “Münchens Beziehungen zu Max Weber und zur Pflege seines Werks”, *Das Faszinosum Max Webers. Die Geschichte seiner Geltung* (“慕尼黑与马克斯·韦伯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对他作品的保存”，《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力——马氏理论有效性的历史》)，K. Borchardt and K. - L. Ay (eds), Constance: UVK, 2006, p. 23.

② *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 Nach südeuropäischen Quellen*（《中世纪的贸易活动史——依据南德文献》），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889；该书最近已经由卢茨·凯尔伯翻译并编辑过；同样参见 *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Partnerships in the Middle Ages*（《中世纪商业伙伴关系史》，Lanham, Mary: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的禁欲主义)作为开始的,但这种解释却与西方现代性何以不同于其他的文明调和在一起。韦伯发现,这与他的最初出发点一样具有强烈的趣味并引人入胜。这种感觉给本书提供了一个轨迹,但它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坚持。韦伯根据这样一个轨迹来规划他的学术生涯并不是想当然的说法。恰恰相反——要搞清楚韦伯究竟是如何从一个研究工程开始再到另一个研究工程的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既然关于这些工程的日期与源头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利用,那就沿着、围绕着并横跨过这条轨线去绘制他的活动图表。

第一章检视了1890年代韦伯在国民经济学领域的职业生涯。虽然这个时期的韦伯还不能被称作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已开始从事关于当时的农耕状况的社会调查研究了,这种调查研究具备了一种社会学的特征。至于这一时期,在解释市场力量以及凌驾于个体与社会群体生活之上的政治权力之决定作用方面,韦伯是否更像一个结构主义者还存在着争论。在人的行为面对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韦伯相当强势地表达了理念与心理动机的作用。尽管韦伯还必须发展显式的社会学,但与众不同的韦伯式结构以及行动的方法却已经相当明显了。韦伯在理论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讲座课程从1898年开始就勾画出了轮廓。能够确切证明的是,他既很好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又根据边际效用很好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的交换经济(exchange economies)。同样明显的是,他偏爱于在经济活动的分析之中插入一个文化的界面。

第二章对于国民经济学领域正在进行的一些重大的资本主义争论进行了定位。特别要注意的是维尔纳·桑巴特和格奥尔格·齐美尔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他们的分析是韦伯自己的新教伦理研究的前身。韦伯从文化上对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争论提供了一个章节的专门解释。该争论是在桑巴特的鸿篇大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中被展现出来的。反过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齐美尔的《货币哲学》(*Philosophy of Money*)——它用一种哲学的模式来处理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的一种回应。首先,桑巴特以及后来的韦伯给在齐美尔的处理中仍然是推测性的现象补充了因果性解释。韦伯的新教伦理“论文”只是有限度地介入到了一场更为广泛的争论之中,但是自从它发表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它构成了有关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PESC(《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给经济上意义重大的宗教群体的心理动机提供了富有灵感性的解释。韦伯并没有精确地说明,那种团体在经济上的意义如何重大,但是对于韦伯以及他的批评者来说,这篇文章的成功都让它变成了持续不断的争论主题。齐美尔对行动心理学理论的贡献得到了讨论,这与桑巴特在其经济活动的理论化过程中运

用的东西非常类似。韦伯的 PESC 仍然停留在同样的心理学框架之内。在韦伯提出一种社会行动的解释（1913 年）之前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然后韦伯通过对宗教行动与经济行动的比较研究才把它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了出来。

第三章评论了 PESC，它重点关注的是韦伯在那种研究中实际上在做的是什麼，而不是韦伯说他在做什么。尽管研究的是一个构想出来的、在国民经济学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但它却是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写出来的。它不仅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学识与特质的工作，而且还具有富有想象力的、文学的性质，这让它完全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模式。韦伯不仅利用史学与哲学的学术成就，他还运用文学的技巧、修辞学以及——最重要的——诠释学，正是这些让文章取得了如此的成功。它是依靠这些最终标准的，当然，这一点还需要进行评定。

第四章注意到，面对着他自己的创造性什么才是有效地向方法论的退却。海因里希·李克特（Heinrich Rickert）方法论的因循守旧受到的偏爱超过了狄尔泰的人文科学研究计划的自高自大。我坚决认为，与李克特的约定俗成的（prescriptive）方法论相比，PESC 更兼容于狄尔泰的雄心壮志。然而，在其 1904 年论述“客观性”的文章中，韦伯却让他自己的文化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解释风靡一时。在当时因为重新发行的《社会学与社会政治学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而发生的方法论之争中，这篇文章代表了一种前进的方法。它还担当了为 PESC 补充方法论的任务，但是在很多方面看，这部作品都已经超越了所有方法论的繁文缛节。它从一开始就招致了批评，就如它在整个 20 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在其对批评者的回答中，多重的因果关系问题显得尤其困难，因为韦伯在理想的原因与物质的原因之间严重依赖于“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

第五章和第六章检视的是，韦伯的著作极大地扩展到关于经济的、比较而系统的研究工作之中，而经济则涉及关于宗教、法律、权力、公共群体的形成以及联合群体的形成的特殊社会学（the special sociology）。为了那部百科全书式的、卷帙浩繁的《社会经济学纲要》（*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韦伯承担起了编辑的责任。在同一时期，大约是 1910 年到 1914 年 8 月，韦伯完成了经济伦理学的初稿，它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印度教、佛教和犹太教的影响。到目前为止，《马克斯·韦伯全集》九个分卷涵盖了这一时期的作品；此外，书信（[Briefe]）那一卷还用图表方式记录了韦伯与他的出版商及其学术伙伴之间大量的、错综复杂的通信。《马克斯·韦伯全集》的编辑们的艰苦而详细的学术成就已经揭示了韦伯多方面研究成果的确切轮廓。第五章